

# 再评王贵明先生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倒退论”

刘放桐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10093)

**摘要:**“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所谓恩格斯、列宁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存在质的差异,即认识论哲学与存在论哲学的对立,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只有否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差异和同一对立起来的人才必然倒向倒退论。

**关键词:**伪命题;倒退;实践观;差异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3-0054-08

王贵明先生在《对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以下简称《评析》)中根据我国哲学界有的学者探讨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便断言他们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对立”起来,提出“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即‘进步’与‘倒退’说,从而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从根本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他进而把这种所谓“进步—倒退”说明说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并把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当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的源头。我写了《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9年第12期全文转载)和《正确认识还是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哲学原理》2010年第3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正确认识》)对之作较为具体

的回应与批评。王贵明先生后来又写了《再评刘放桐的马克思、恩格斯进步—退步论》(《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以下简称《再评》)。其中对我向他提出的批评没有作任何正面回答,而是继续用扭曲的概念来论证他的原有观点。这次他没有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而是改称为由笔者“引领的思潮”。但仍然把俞吾金、吴晓明、杨耕、衣俊卿等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拉扯进来,似乎他们都是在我的影响下也坚持所谓“进步—倒退”说。考虑到王文对不了解我们的争论的实质的读者容易产生误导,我不得不再写文章讲明某些相关情况。关于他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笔者将另文揭示。本文将集中揭示他所谓“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他所谓恩格斯、列宁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存在质的差异,即认识论哲学与存在论哲学的对立,都出自他的虚构;只有否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差异和同一对立起来的人才会必然倒向倒退论。

收稿日期:2011-03-07

作者简介:刘放桐(1934—),男,湖南桃江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一、“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

只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稍有常识,都会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恩格斯曾明确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起了主导作用,但马克思是和恩格斯密切配合而创立其理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领性文献也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从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而作为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的附录于1888年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提纲》,认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sup>①</sup>,说明他完全赞成《提纲》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他们各自本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的统一。针对唯心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破坏作用,恩格斯在他的几部主要著作中重点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因而与马克思在《提纲》等论著中重点强调实践显得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客观存在的。读过《提纲》和《终结》的人只要没有先入之见,都不难感受到二者在重点上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原则区别,当然也不意味着恩格斯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与强调实践的观点不仅不相冲突,反而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提纲》虽然强调的是实践,但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实践的。《提纲》既批判了不懂得实践的作用的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sup>②</sup>的唯心主义。恩格斯的《终结》既维护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又蕴涵着对实践的观点的高度肯定。

恩格斯在分析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未能对他本人在社会历史领域避免唯心主义的原因时说:“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

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紧接着这段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sup>③</sup>

恩格斯的这些话表明: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不能停留于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要从唯物主义出发进一步转向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转向“在历史中行动的人”,而这也意味着转向人的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也正是这种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使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所建立的学派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sup>④</sup>。

上述源自《终结》的引文的重点(黑体字)是笔者加的。之所以加上重点是想表明,即使在《终结》这部主要是维护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著作中,恩格斯同时也对社会实践的观点(“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劳动发展史”)作了明确的阐释。我的确说过“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我现在也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在这些著作中更加关注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这也是认真看过这些著作而又不抱先入之见的人都不难感受到的),并没有说这些著作不能同时关注实践,更没有说它们排斥实践。当恩格斯在《终结》中谈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时,他关注的当然是怎样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而不是别的内容。当恩格斯谈到“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时,当他称由他和马克思所建立的派别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时,他所关注的就是唯物史观及作为建立唯物史观的前提的社会实践了。

恩格斯的这种认为不能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而必须转向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观点不是个别地、偶然地说出的,而是他和马克思所共同强调的基本观点。他晚年在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中对此作了同样明确的论述。例如,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

命题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sup>⑤</sup>恩格斯在此既肯定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肯定,但是他同时又肯定了必须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来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他所谓“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是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对经济因素的解释,也就是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来看待唯物主义原则。在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他对把唯物主义当做套语的风气作了尖锐的批判并明确地与之划清界限,指出他和马克思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sup>⑥</sup>。在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同样表达了他对满足于玩弄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态度的否定。

总之,在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把科学的实践的观点当做其哲学的核心观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与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并不相抵触。马克思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并不妨碍他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肯定。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在几本主要著作中没有肯定现实生活和实践在他们的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的《终结》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王贵明先生说我认为恩格斯在主要著作中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在其他著作中才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并说我在此持“马克思恩格斯异质差异论”,这是对我的观点的彻头彻尾的扭曲。

王贵明说我认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这也完全是他自己所虚构出来的。

列宁主义是俄国特殊发展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是在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现实革命斗争中进行的。这一点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必然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他的哲学著作必然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又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是针对党内一些人企图用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而写的。捍卫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自然成了他的重点,从而显得与马克思的《提纲》重点强调实践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列宁对唯物主义的强调同样蕴涵着对实践的强调。他在《唯批》中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sup>⑦</sup>列宁直接论证的是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

识论的基本观点,但这种论证中蕴涵着对全部唯物主义的论证。重点是认识论,但同时又有超越认识论的意义。列宁在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中都一再肯定和强调实际生活和实践的意义。例如在《共产主义》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sup>⑧</sup>在《哲学笔记》中,他同样明确地指出了理论(包括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依赖。因为正是实践使具有一般性品格的理论成为可能并使这种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sup>⑨</sup>,因此,说列宁的观点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或者说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同样是对列宁的曲解。

至于说毛泽东思想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那更是荒唐至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特殊发展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正是在他领导中国人民的现实革命斗争中进行的。无论是他的专门的哲学著作,还是他为中国的革命指出方向、制定战略和策略的著作,无不渗透着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和客观实践的关注。毛泽东的《实践论》一开始就指出了旧唯物论(也就是近代唯物主义)的片面性:“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sup>⑩</sup>毛泽东在此明确地把实践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阶级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把实践性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sup>⑪</sup>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统一、认识和实践统一一样,毛泽东对把主观和客观分裂开来的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分裂主客观的错误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sup>⑫</sup>

总之,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他们的理论重点必然各有其特殊性。但是,他们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肯定现实的、客观的实践在其哲学中的首要作用,与马克思把对实践、“能动的方面”、“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强

调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完全是一致的,这是一清二楚的。请问王先生:何谈他们的哲学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水平?

我在此必须指出,王贵明说:“刘放桐却把恩格斯、列宁‘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视为与这些传统西方哲学在持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这是彻头彻尾对我观点的歪曲。请问,我在什么地方说过恩格斯像传统西方哲学家那样持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着重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就不能同时肯定社会实践的原则?究竟是谁在编造恩格斯的倒退?

## 二、谁在把恩格斯、列宁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

王贵明在《再评》第一节第一段的后半段说:“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由于仍然坚持近代西方哲学的‘心物、主客、灵肉、思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质的差异,从而是从马克思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向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倒退。”

王贵明把上述这些话表达的观点说成是我的观点,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种观点我不仅从来没有提出或赞同过,而且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关于“恩格斯等人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伪命题”是我一贯的观点。它与王贵明所捏造的观点正好相反。

我的确说过不少西方近代哲学家由于把心物、主客、思有的区分绝对化,看不到它们的统一,从而陷入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但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说过或暗示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也有这样的片面性。

王贵明为了证明我批评了恩格斯等人的所谓“倒退”,引述了我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以下简称《论纲》)中一段批评哲学界一些人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作的解释有时也的确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哲学家的学说,但未能超越这些学说由以建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仍然按照追求万物本源、本质,并成为人的一切行动和认识的基础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变革,使它倒退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

这段话引自该文第二节(“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的第二小节(“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我在此先讲了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但我根本不是指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肯定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主客观的统一,反对将心物、主客割裂开来的任何形式的二元论),而是指一些曲解马克思也曲解恩格斯、列宁的人。正是这些人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恩格斯、列宁,把他们拉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

顺便说一下王贵明的一个相关的荒唐的逻辑。《再评》在谈到我对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时说:“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阐释者;如果恩格斯的阐释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刘放桐所说的‘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他的批判就是无的放矢,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理解的批判就没有了根据。”

不错,恩格斯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第一位解释者。但是,除了恩格斯以外,其他人就不能对马克思哲学作出解释吗?在恩格斯之后,从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人知多少!其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就往往是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至于王贵明后面接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类人如何批评恩格斯,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人批评恩格斯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能批评那些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不知道王先生此处的话是词不达意,还是的确是逻辑上的荒唐。

回到上面王先生所引的我的《论纲》的话上来。

在王先生所引的话的那一小节的后半部,我阐释了按照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把实践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核心观点。我在此指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作本原或本体,不是企图在实践基础上去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客观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如何理解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但我认为至少应当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实践不是单纯的物质或精神活动,而是包含了二者的统一的能动的活动;实践不只是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感性和理性的统

一；实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与实践相应的不只是知，而是知情意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哲学之陷入种种片面性、矛盾和迷误，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未能正确理解人的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这段话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包括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学说）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客观统一、感性和理性统一、知情意统一以及由此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其含义是一清二楚的。对于同一小节中的这些话，王先生应当看到过。然而他竟然指责说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心物、主客、灵肉、思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难道不是故意颠倒是非吗？

王贵明在引述我上面那段批评有些人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段话后接着说：“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恩格斯、列宁，但是联系前面刘放桐认为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恩格斯、列宁强调的是‘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则是存在论哲学，于是就出现了在刘放桐研究的理论逻辑主线推演下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上的对立。”

我的确讲到过恩格斯和列宁在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强调的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在《提纲》等著作中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实践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恩格斯、列宁这些著作没有肯定实践，更意味着他们排斥实践，从而也不意味着他们在这方面与马克思存在原则区别。他们与马克思的区别只是在不同情况下、为着不同目标在阐释重点上的区别。恩格斯的《终结》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们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恩格斯、列宁在某些情况下关注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哲学就只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而不能关注诸如存在论、方法论、历史观、价值论等哲学的其他部分，这正像恩格斯批判过杜林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就仅仅是杜林批判哲学一样。

王贵明说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在哲学上的关系看做是“在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上的对立”，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我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存在论哲学概念，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提出过这个概念。我倒是发觉了，在我讲到实践（或者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社会实践）的地方，王贵明都将其改成了“存在论哲学”。我指出马克思强调实践在王先生那里大都被改成了强

调“存在论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他的《提纲》中就已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它与被王先生作了唯心主义解释的“存在论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偏爱“存在论哲学”是个人的自由，但谁也没有权利把别人讲的实践改为“存在论哲学”，更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在《提纲》中那样清楚解释过的实践改为“存在论哲学”。

王先生所谓“认识论哲学”也与我毫不相干。我的确谈到过恩格斯、列宁关注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他们的哲学看做就是认识论哲学。我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认识论哲学这个概念。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较多谈及，这里就不说了。

既然王先生的所谓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都与我毫不相干，而只是他自己的编造，那我不知道他所谓“在刘放桐研究的理论逻辑主线推演下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上的对立”究竟是按照怎样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王先生还引证了恩格斯在《终结》中的一段话来证明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体系，“与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不同”。我们就来看看恩格斯这段话是怎样讲的：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sup>⑬</sup>

这段话明显地包括两层意思。从开始到“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是第一层。其中第一句“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是对第一层意思的概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如何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分离而返回到唯物主义。往下是对这一返回过程的内容的阐发。到此为止，恩格斯说的主要还只是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没有特别强调与费尔巴哈等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他才说“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下面的“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

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是这段话的第二层意义。它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何以能“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何以能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呢？这就不能仅仅依靠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了，它必须与辩证法相结合。恩格斯在下面一长段中讲的就是如何批判地继承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怎样得以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呢？恩格斯在《终结》中已经作出了回答。我们上面曾引述恩格斯的话：“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恩格斯这些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要求建立科学的实践观。他把马克思的《提纲》作为附录发表并给予高度评价也表明他赞成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科学实践观，没有马克思在《提纲》等论著中所明确阐释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王先生喜欢谈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如果撇开实践的观点，也会成为空话。

王贵明先生在恩格斯上面那段话中看到的只是第一层意义，即恩格斯对从黑格尔回复到唯物主义的论述；至于恩格斯的第二层意义，特别是恩格斯讲的如何超越费尔巴哈而又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则完全置于他的视野之外，更谈不到对马克思的《提纲》的关注了。

### 三、否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作用必然导致倒退论

王先生不仅把恩格斯、列宁拉向倒退，而且也把马克思拉向倒退。这里关键的是他在如下两个问题上陷入混乱：1.他否定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核心观点），把它与唯心主义相提并论；2.他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原则上的统一（同一）与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论述重点上的差异绝对对立起来，由他们存在差异而否定了他们的统一，由他们存在统一而实际上否定了他们存在的差异，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无论在《对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以下简称《评析》）中还是《再评》中，王贵明都没有正面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究竟是什么，但

他都明确地反对把实践的观点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从而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倒退到了旧唯物主义者的一般唯物主义。

在《评析》中，王贵明把哲学基本问题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由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主客、心物关系问题不能超越而否定把心物、主客二元分立绝对化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能够超越，质疑马克思“批判了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他非常明白地提到：“在理论逻辑上不能在既肯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肯定马克思超越了心物、主客、灵肉、思有‘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这明白无误地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就不能批判把主客、心物等割裂开来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既如此，还能谈得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吗？因为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客、心物等对立统一起来，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因把这种对立绝对化而导致的二元论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和怀疑论，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主要内容。

王先生在《评析》中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的提法，认为这改变了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的追问。因为在他看来，“实践、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等作为人的活动和世界，‘以主客观统一为特征’，并不具有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的追问的特点”。他还以反对实践唯物主义为借口，明确反对将唯物主义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说什么“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就是陷入了“‘方的圆’的悖论”。

总之，只要对物质性的追问、不要实践，只要客观、不要主观和在肯定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客观的统一，这是王贵明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读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读者都不难发觉，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本人所表述的观点恰好相反。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就明确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④</sup>这意味着马克思所明确坚持的观点正是王贵明所明确反对的。

对于王先生在《评析》中这种把唯物主义和实践对立起来，否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根本观点的态度，我在《正确认识》一文中曾作过具体的揭露和批评。我也引述过马克思在《提纲》中对

实践的观点在他的新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的明确阐释,希望引起王先生对马克思的注意。然而他没有求实地考虑过我的批评,在《再评》中又把《评析》的观点重新搬出来,再次反对把实践的观点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他引出了我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那段话:“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他由我这段话得出我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在归结为他作了唯心主义解释的存在论哲学,说什么我“把这种马克思哲学是存在论哲学的理解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在”。在此,实践和现实生活的观点被王贵明曲解为他所谓的唯心主义的存在论哲学,以此为经典所在的马克思哲学自然就被篡改为唯心主义哲学了。

《再评》中有这样一段话:“既然刘放桐认为马克思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同质性的哲学,批判了坚持‘主客、思有、灵肉、心物’二元论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哲学上共同进步到了存在论(生存论)哲学,马克思(这里似乎也包括恩格斯列宁)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是一致的;同时恩格斯、列宁为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着重阐述了作为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认知论哲学,批判了‘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共同持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又共同批判了‘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在理论逻辑上就不可理解。”

我上面已经论证过,王先生所谓马克思和西方唯心主义流派共同开创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同质性的哲学,二者共同进步到存在论(生存论)哲学等都是他自己的任意编造。但从他这段话也可看出,他明确地把坚持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他称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对立起来,认为批判唯心主义就不能坚持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坚持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就不能批判唯心主义。他明确无误地把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做是唯心主义的存在论哲学观点而加以否定。

主张哲学应当向人的现实生活,把客观实践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核心观点,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虽然有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但双方在强调实践的观点的决定性意义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坚

持唯物主义当然重要,否则就可能滑到唯心主义的邪路上去。但仅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哲学家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不能说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了。只有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同时肯定科学实践观的决定性作用,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我个人十多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观点。我发觉这也是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人所坚持的观点。最近我研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觉该书所阐释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该书在讲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时专门设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一节。其中明确指出:“物质第一性是所有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主张,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sup>⑥</sup>在下一节中,该书再次谈到只有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才能实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建议王贵明认真研读这部教材,我想这对他摆脱在对待实践的观点上所陷入的混乱会很有启发。

王贵明在上面那段话后接着说:“恩格斯列宁既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也即坚持了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同时又与马克思一致(也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一致)从而达到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居然奇特地存在于刘放桐的研究中。”

在此,“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被王贵明先生等同起来了,这是荒唐的。难道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中就没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吗?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难道就是唯心主义吗?难道恩格斯、列宁坚持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就必然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就不能与马克思一致,就不能达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此陷入自相矛盾的并非把唯物主义观点与实践的观点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统一起来的人们,而是把二者割裂开来、把马克思及其实践的观点当做是与唯心主义流派一致的人。

现在我来讲王贵明怎样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原则上的统一(同一)与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论述重点上的差异绝对对立起来,由他们存在统一而实际上否定了他们存在的差异,由他们的差异又否定了他们的统一。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占了《再论》的大部分篇幅,主要是批评我关于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之间存在差异。考虑到我在有关论文中对此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仅拟简单提及如下三个问题:1.恩格斯、列宁和马克思之间是否存在差异?2.如果存在差异,那主要内容是什么?3.这些差异是否妨碍他们在原则上的一致?

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理论,就不能否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之间,而且它的各个代表人物本身在不同时间和境遇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阐释上都必然存在着差异。肯定差异是肯定发展的前提;不承认差异,就根本谈不到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此一再强调要把他们的理论当做发展着的理论。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①</sup>列宁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sup>②</sup>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同样如此。王贵明先生的混乱之一就表现在他否定了这种差异,一谈到差异,他就认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哲学上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呢?当然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的差异。这种基本原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点上: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当做自己的主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观点当做是自己的核心观点,或者说根本观点。这两点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突出特点,即其阶级性和实践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大特点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而且应当随着具体的现实条件的变化有不同的强调。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中就谈到了他和马克思为什么在一段时期面对着唯心主义盛行的情况较多地强调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较少强调其他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就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事实上,他们在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时,也同时在以某种方式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王贵明在这方面的混乱正表现在他只看到所有唯物主义者共有的对物质先在性的肯定,而忽视了甚至根本就不懂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独有的对科学实践观的强调。他也因此把唯物主义倒退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他之所以把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肯定归

结为认识论哲学,把对实践的肯定当做唯心主义的存在论哲学,也正是出于他的这种混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条件下强调的重点不同,或者说存在差异,是否会妨碍他们在原则上的统一?王贵明是否定的,我是肯定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本来就是在共同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差异。同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同一,这本来是辩证法的一个常识性问题。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正是通过这种差异而在内容上更为深刻和丰富,更具有生命力。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这种差异的统一史。王贵明先生把我既肯定差异又肯定统一(同一)的态度叫做“二元论手法”。这是把二元论用错了地方。所谓二元论指的是把对立(差异)双方绝对对立起来和分离开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王贵明自己的论证正是这种方法。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实践而使差异(对立)各方统一起来,这正是辩证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和王贵明先生之争,在方法论上正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坚持形而上学之争。

####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④同③,第258页。
- ⑤同③,第695—696页。
- ⑥同③,第692页。
- ⑦《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4页。
- ⑧《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13页。
- ⑨《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页。
- ⑩《毛泽东选集》1964年合订本第259页。
- ⑪同⑩,第261页。
- ⑫同⑩,第272页。
-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
-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4页。
- ⑮《马克思主义哲学》,第3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
- ⑰《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页。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 dalishi\_sohu@sohu.com)